

论《阿 Q 正传》的 文体特征及其解读方法

杜圣修

《阿 Q 正传》无疑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座突兀巍峨的高峰。七十多年来 , 评介、阐释它的论著之多 , 堪称本世纪文学史上的奇观。综观这些论著 , 可以看出人们都把此作当作通常的写实体小说。其实这是对《阿 Q 正传》文本类型的错误解读。七十年来 , 论者们对此作主题意蕴的种种歧见 , 对阿 Q 形象的类属、典型性、阶级性等诸多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 , 以及对此作的艺术方面缺憾的种种批评 , 均与这种误读有密切关系。

其实 , 《阿 Q 正传》从根本上说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写实体小说 , 也显然与鲁迅的其他的现实主义小说不同。从文体类型上说 , 它是讽喻小说。所谓讽喻 , 就是不用正言 , 而以托辞婉言来暗示、告晓、劝说。讽喻体小说 , 则是不用正言 , 托故事进行暗示、告晓、劝说。小说史前期的寓言、宗教故事等 , 就属此类雏型作品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所提到的晋朝“幻设为文”、“寓言为本”类的作品 , 如阮藉的《大人先生传》 , 刘伶的《酒德颂》 , 陶潜的《桃花源记》、《五柳先生传》 , 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王绩的《醉乡记》 , 韩愈的《坊者王承福传》 , 柳宗元的《种树郭橐驼传》等 , 多数已属讽喻体小说的成型文本。传奇小说中也有一些讽喻作品。其后的宋、元、明、清小说 , 类似作品并不少见。文艺复兴以来的外国近现代小说 , 如拉伯雷的《巨人传》 , 塞万提斯的《堂吉诃德》 , 斯威夫特的《格列佛游记》 , 狄德罗的《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》 , 冈察洛夫的《奥勃洛摩夫》 , 谢德林的《一个城市的历史》等 , 都属讽喻体小说。在西方现代派小说中 , 此类作品则更为常见。卡夫卡的《城堡》、《审判》、《变形记》 , 波伏瓦·西蒙娜的《人无不死》 , 加缪的《鼠疫》之类 , 就是其中很有名的几部。

中国现代小说 , 也不乏此类小说。如朱湘的《猫诰》 , 胡适的《差不多先生传》 , 沈从文的《阿丽思中国游记》 , 老舍的《猫城记》 , 张天翼的《鬼土日记》 , 张恨水的《八十一梦》等。中外的讽喻小说 , 虽然种类繁多 , 体式与风格各异 , 但按其内容真实性程度 , 大致可分为虚幻型、写实型、虚实交织型三种。因“寓言”而为文 , 借此喻彼 , 借小喻大 , 则是各类讽喻体小说的共同特点。

《阿 Q 正传》基本上属讽喻小说的第三种类型 , 在艺术上具有莫大的独创性。鲁迅在谈到《阿 Q 正传》写作时说 : “果戈理作《巡按使》 , 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 : ‘你们笑自己 ! ’(奇怪的是中国译本 , 却将这极紧要的一句删去了。) 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 , 一下子就推诿掉 , 变成旁观者 , 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 , 又像是写一切人 , 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。” 由于作者对小说的艺术效果有如此刻意追求 , 促使他在《阿 Q 正传》中创造出一种颇具个性的崭新的讽喻小说的话语形式。

小说的“第一章序”便不仅充分显现出颇富个性的讽喻文体与风格特征 , 还多方暗示、提醒读者注意小说的讽喻性 , 以免造成误读。此序可谓打破传统 , 匠心独运。通常的序是独立于本文之外 , 自成一篇。而《阿 Q 正传》的序则是全书九章之一 , 也是全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序的内容是作者以调侃语调谈论自己写作此传时的心境 , 及其遇到的四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, 是怎样在无奈中所作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抉择。它实际上告诉了读者这样三个问题 : 一是传文的写作动机奇特。阿 Q 远不是“不朽之人” , 决定传文绝不会成为“不朽之文”。为什么还要作这篇必然“速朽的文章”? 因为阿 Q 使他不能忘怀 , 心

里仿佛像有鬼作祟似的。这无疑使小说蒙上了某种隐秘性。二是传文奇特。因为已有的传名虽多,但与本传内容不合,只好套用“正传”这个不伦不类的名字。这显然是在提醒读者不能把此传视为通常传记来读。三是传主奇特。阿Q无确凿的姓氏,无确凿的名字,无确凿的籍贯。他唯一确凿的东西是“阿”字。但“阿某”又是中国许多地方习常的命名模式,阿属前缀词,并无实在意义。它不仅不能增加阿Q其人的确定性,反倒突出了他的不确定性。阿Q常住的“未庄”,会令人联想到此乃“未有之庄”,即不存在的地方。其实阿Q的不确定性还有不少。如:先人与父母是谁?何方人氏?有无亲故?“先前”怎样?……。作者有意在阿Q身上留下诸多空白,并极力渲染他的不确定性,目的在于尽量将阿Q虚幻化,从而提醒读者,阿Q并非常人,不能以常人看待。就是这个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奇怪人物,鬼使神差似地缠住了作者,促使他为其作正传,这就使整个作品蒙上了些许隐秘性、幻奇性色彩。作者这样做的目的,就是要诱导、启发读者去思考阿Q其人与整个作品的讽喻性、寓意性蕴涵。鲁迅之所为传主起阿Q这个新奇古怪的名字,还想借此赋予阿Q形象以象征性寓意。Q字,从外型上看,很像拖辫子的脑袋。鲁迅曾说过,他觉得Q字上边的小辫好玩。而“辫子”则是《阿Q正传》反复出现的重要意象,具有多重象征寓意。对另一个用英文命名的小D,称其为小D。鲁迅曾解释说,小D叫“小同”,大起来是和阿Q一样的。可见小D是作者心目中的阿Q第二与传人了。这一切同样反映出《阿Q正传》的讽喻文体特征。

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说,自唐代无名氏作《白猿传》始作俑,“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”,就一直在我国文坛流行。清末谴责小说“堕落而为‘黑幕小说’”,更是专事“丑诋私敌”。此种小说,在20年代虽然已过全盛时期,但其余绪经过改头换面,仍然以强劲势头流行,以至于报纸上“揭开黑幕和攻人阴私的一类文字”屡见不鲜。为此,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曾发表《劝告勿再编黑幕小说之意见书》,著名的新文学理论家、批评家周作人接连发表《论“黑幕”》、《再论“黑幕”》。正如鲁迅所说,中国一方面是流行“假小说以攻击人的风气”,另一方面是“古今文坛消息家,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。”鲁迅写作《阿Q正传》时,已经预料到此作的内容可能引起种种误会,认为它是假小说以报私仇

的影射之作。为了避免这种误读,“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”,达到讽一劝百的目的,才写了那篇“可以算是序”的奇妙文章,并用颇有独创性的讽喻小说话形式来描述阿Q其人其事了。

《阿Q正传》巧妙而广泛地采用了“寓意”(寄托或隐含旨意)的艺术方法来表现“寓意”(寄托或隐含的意思)。小说是因“寓言”(有所寄托之言)而作。它的“寓言”几乎包括了鲁迅长期思索积累形成的改造国民性的主要思想见解。让一个中篇小说来承载如此丰富多彩的思想意蕴,“寓意”的艺术方法可能是最佳的、也是唯一的选择了。《阿Q正传》“寓意”的主要方式是:

借助故事。《阿Q正传》是由一系列小故事按时间顺序连缀组合而成的小说。这些小故事有不少是具有某种或多种寓意的。如:种种精神胜利的故事;与王胡捉虱比赛的故事;自掌咀巴的故事;与小D龙虎斗争的故事;革命的故事;画圈花押的故事;“团圆”的故事等。《阿Q正传》的故事虽然寓意丰富多样,但其核心的寓意是:精神胜利的荒唐与危害。从深层寓意来说,它讲述的是一个一生精神胜利最后终至失败的心灵故事。阿Q靠精神胜利妙法,来化解、消泯痛苦,把一生中一次又一次的实际上的失败转为精神上的胜利,从而使他“常优胜”,永远在“胜利”的陶醉中感受、玩味着愉悦与满足。然而当他被游街示众,发现看客的可怕的“眼睛们”,不但在咀嚼他的话,而且在咬他的魂灵时,终于在心里发出无声的“救命”痛苦低语,并带着这首次感悟到的痛苦离开人世。阿Q的系列小故事,是被编排在阿Q的上述心灵故事的框架之内的,它在情节结构与思想意蕴两方面起统摄作用,并隐含着全书最基本的极富哲理性的旨意。

借助人物。阿Q不是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典型人物,而是讽喻小说中的象征性、寓意性的典型人物。还未正式登场,就被作者有意虚幻化了,象征化了,以便让他充当“寓言”、“寓意”的载体。鲁迅说:他写《阿Q正传》,是“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”。小说兼用写实与寓意两种艺术方法,出神入化地勾勒出阿Q这个地道的“沉默的国民的魂灵”。乍看起阿Q个性独一无二,思想言行常常奇特古怪,但它们却相当典型地反映出国民共同的劣根性。举其要者如:健忘;奴性;卑怯;守旧;夸大狂;完满欲;假道学;无是非;无特操;自寻开心;以丑骄人;看客心态;随遇而安;知足常乐;喜听奉承;乐攀同宗;嗜

辫子与小脚 ;对羊显兽相而对兽显羊相 ;浑浑噩噩 ,难得糊涂 ;得过且过 ;无端的憎恶革命 ;以赏玩他人痛苦为乐 ;“祸水论 ”与“难养论 ”的女性观 ;习于向内寻求精神胜利 ;根深蒂固的尊卑上下等级观念与纲常名教思想 ;盲目认同正统 ,排斥异端 ;既痛恨别人的以强凌弱 ,自己却也热衷此道 ,甚至以此为乐 ;二重思想与人格 ;自以为是 ,妄自尊大 ,却又自轻自贱 ,自我贬损 ;惯于瞒和骗 ;用对于“运命 ”的“事后不费心思的解释 ”来自欺自慰 ;以“威福 ,子女 ,玉帛 ”的“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满足 ”为“最高理想 ”;没有自主的人格与自我意识 ;以祖传的老谱与社会因袭惯例为己见 ;缺乏求生意志及对生命的尊重。可以说阿 Q 身上几乎会集了鲁迅所发现的中国人的所有的不良的品格、精神 ,成为他心目中的病态国民范型。难怪周作人说阿 Q “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‘混合照相 ’”了 ! 尽管鲁迅把如此繁多的国民性痼疾会集阿 Q 一身 ,却并不给人以堆积、造作之感 ,妨碍阿 Q 成为像现实主义小说中那样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典型人物。这一方面是因为小说的“寓言 ”的文体特征及寓意写法 ,为阿 Q 承载尽多的寄托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性与合理性。另一面由于阿 Q 性格的多样性、复杂性 ,在其主导性格 —— 精神胜利的统摄下 ,得到了完满和谐的整合 ,几乎达到了浑然一体 ,自然天成的境界。

为了达到预期的讽喻效果 ,《阿 Q 正传》在描写阿 Q 时 ,有意在写实中融纳怪诞手法 ,用喜剧式夸张、变形 ,对阿 Q 的个性与思想言行的特殊性 ,进行超常夸张 ,使之脱离生活原态 ,获得怪异、荒诞的品格特征。如 :阿 Q 对“忌讳 ”的“推而广之 ”,他取得精神胜利的具体缘由与做法 ,都是极其荒唐的。他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“自轻自贱 ”的人 ,除了“自轻自贱 ”,余下的就是“第一个 ”,于是 ,认为这与状元的“第一个 ”是一回事。这种推理荒诞不经。他连打自己的嘴巴 ,尽管热辣辣的有些痛 ,竟会感到打的是自己 ,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 ,不久就仿佛是自己打别个人一样 ,虽然仍然有些热辣辣的痛 ,却能“心满意足的得胜 ”。除非精神病患者 ,常人是不会如此的。小说写阿 Q 被赵太爷打了之后得意了多年 ,写阿 Q 与王胡捉虱比赛 ,写阿 Q 出奇的“健忘 ”的种种表现 ,写阿 Q 用“人生天地之间 ,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 ,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 ”来消解“懊悔 ”等等 ,显然都是与生活常态相悖离的。《阿 Q 正传》这样表现阿 Q 个性与思想言行的怪诞性 ,目的是使读者在审美观

照时引起惊异与思考 ,从而发现、领悟、认知阿 Q 与自己 ,乃至全体国人内在品格、精神的酷似、同构、等同。表面上看阿 Q 处处与众不同 ,但仔细反思起来 ,他的内在的品格、精神 ,他的价值观、道德观、社会观、政治观、人生观、处世哲学 ,他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,与中国人无处不相同。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在当时 ,还是现在 ,或许永远 ,人们总会在阿 Q 身上发现自己和别人的阿 Q 性、阿 Q 相的重要原因吧。

阿 Q 虽然承载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诸多思想见解 ,但核心是他对中国民族最严重的痼疾 —— 精神胜利的反思与批判。鲁迅曾指出 :中国的百姓“默默的生长 ,萎黄 ,枯死了 ,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 ,已经有四千年 ! ”阿 Q 就是这样的中国百姓的象征与魂灵。阿 Q 属鲁迅在《灯下漫笔》中所说的中国等级社会第十等“台 ”类人物。最卑贱的地位决定了他只能被人凌虐 ,被人吃 ,而没有机会去凌虐别人 ,吃别人。“台 ”还有更卑的妻 ,更弱的子 ,供他驱使。而阿 Q 却是连妻与子都没有的人 ,仅此一点就“太苦 ”了。阿 Q 遭受的被人凌虐、被人吃之苦 ,难以言状 ,却从不叫苦 ,那怕是低微的呻吟。因此阿 Q 被鲁迅称之为“沉默的国民的魂灵 ”。阿 Q “沉默 ”的根源 ,在于精神胜利妙法。它不仅能随时瞬间化解、消泯了他的心灵的苦 ,还能使他永远处在悦愉与满足之中 ,因而 ,不可能产生任何叫苦、呐喊的欲望。其结果必然是“从昏睡入死灭 ”。小说借此要表达的讽喻寓意是 :中国民族要新生 ,国民必须改变、超越这种由心灵的“死灭 ”而来的“沉默 ”的可怕生存状态 ,而要做到这点 ,则必须从摈弃自我麻醉的精神胜利开始。

阿 Q 所生存的社会中的所有无名氏人物全体 ,也属象征性、寓意性人物。在小说中 ,这些人物的全体称谓是未庄人 ,未庄的居民 ,未庄 (指代) ,村人 ,居民等 ,部分的称谓是未庄的闲人们 ,一班闲人 ,闲人们 ,听到的人或人们 ,看到的人或人们 ,知道的人或人们 ,鉴赏家 ,看客等。有时也用大家、人们、他们来指全体或部分。尽管称谓不同 ,有全体与部分的差异 ,但他们总是以类群体身份与面目出现。读者仿佛可以听到他们的共同笑谈话语 ,感受到他们共同的脉搏与呼吸 ,领略出他们共同的品格精神及共同的思维与行为方式。即使是个体行为 ,如揪住阿 Q 辫子碰响头 ,逼迫阿 Q 说“打畜生 ”等 ,小说中仍然用“闲人 ”或“人 ”这样抽象的类名词称谓“这一个人 ”。鲁迅这样做 ,是有意把这些人类泛化 ,象征化 ,以便让他们承载自己对于中国“庸众 ”、“群众 ”的思想见

解。这些人，不论是以全体还是部分的面目出现，其声音、话语、行为绝对同一。这是无个性的等同人组成的类群体。他们与阿Q是同一民族、同一祖先，生活在同一社会，被同一的文化模式塑造，承袭着同一的以往的老例与社会通行惯例，自然有与阿Q相同或相似的品格精神。但他们缺乏阿Q的几分质朴、天真。他们体现了鲁迅所认为的中国国民性中的最丑恶、卑劣方面。如：本能地认同富贵者、权势者与官府，鄙视卑下者；卑怯，巧滑，看风使舵，明哲自保；以凌虐卑弱者为乐；变态的围观欲与看客心理；赏玩弱者被强者凌虐之苦自愉；围观、怂恿弱者之间的争斗取乐等。作为看客，他们对游街示众情有独钟。围观时“张着嘴”，精彩处发出“好！！！”的呼喊，如“豺狼的嗥叫一般”，真可谓全身心地投入。他们虽已由此获得难言的快感，却仍然不满足，期盼更热闹的示众出现。这些人是鲁迅心目中的“庸众”的范型。“庸众”这一象征性寓意性类群体形象，既对象征性寓意性主人公阿Q起烘托作用，也借此暗示出“国民魂灵”的别一面，丰富了作品讽喻性的内涵，增强了小说的讽喻效果。

除了用象征性人物来寓意外，《阿Q正传》还常借象征性的意象、场景、情节等来寓意。主要有两大类：

一是关于辫子的。那Q字的上边的辫子，对于主人公阿Q来说，既是形体的标志，也是名称符号。小说中反复出现关于辫子的象征性意象、场景、情节：人们在凌辱阿Q时，总是揪住他的黄辫子碰响头；阿Q与小D发生龙虎斗时，各自一手揪住对方的辫子，一手护住自己的辫根；假洋鬼子因没有辫子，受尽各种无辫之苦，被阿Q叫着“里通外国的人”，气愤地骂为“禿驴”；因他的老婆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，不是好东西，由此失去了给阿Q作女人的资格；革命中不好的革命党捣乱，强行剪辫子，七斤成了闻名乡里的受害者；未庄人逐步盘辫；阿Q下决心效仿，也盘上辫子；阿Q看到小D也盘辫，义愤填膺，要惩办他作革命党的罪；未庄人见盘辫的人走来，大嚷“革命党来了”；假洋鬼子取下假辫子，露出本相来；与假洋鬼子相约革命的赵秀才，本想到城里结交革命党，但怕被剪掉辫子，只好托假洋鬼子代劳，然而最后还是被剪掉了辫子；审讯阿Q的革命党人，有的剃得精光，有的如假洋鬼子等。上述诸多关于辫子的象征性意象、场景、情节，其寓意颇多，举其要者有：小说展示的是拖辫子的人的品格、精神、社

会、人生；辫子真是中国人的“宝贝和冤家”；所谓革命，无非是剪辫、盘辫的一场喜剧；人们理解的革命是复明反清——“排满革命”，却不愿去掉满清民族奴役的标志辫子等。

二是关于围观的。《阿Q正传》中多次出现围观的象征性的意象、场景、情节。如：阿Q向围观的人如醉如痴地讲述自己围观到革命党被杀头示众“盛举”。阿Q作为恋爱悲剧的主角，刚因要和吴妈“困觉”闯下了大祸，而且被大竹杠打过。但到吴妈哭闹寻死时，竟忘却这一切，旋即由主角变成了看客，直到看见大竹杠，才悟到自己曾经被打，和这场热闹似乎有关系。酒店里的人围观阿Q戏弄尼姑，为满足赏鉴家起见，再用力一拧，才肯放手。围观阿Q与小D间“龙虎斗”的看客们，为了满足自己的赏鉴趣味，一边虚心假意地解劝，一边有意地怂恿、煽动。《阿Q正传》结尾更是生动地描写了蚂蚁似的看客如何张着嘴，赏鉴阿Q被游街示众的“盛举”。为了不使围观者小瞧自己，阿Q先是想唱几句戏，最后是“无师自通”地说出“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”的话，博得看客们发了“好！！！”的豺狼一样的嗥叫。他们的眼睛，比豺狼更可怕，又钝又锋利，不仅咀嚼阿Q的话，还连成一气，在那里咬阿Q的魂灵，迫使他心里说出“救命……”。

上述有关围观的意象、场景、情节，同样是寓意甚多。除了借以暴露围观癖与看客心态，以及乐于赏玩他人痛苦等国民性痼疾之外，还寄托了鲁迅的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见解。如：“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”。“群众——尤其是中国的，——永远是戏剧的看客。”鲁迅对于“辫子”，“示众”，“看客”，可说是刻骨铭心，感慨良多，见解良多，借助讽喻小说形式与象征的艺术手法，作了一次较全面、充分的表达。

《阿Q正传》采用了新颖别致的叙事方式。

第一章用第一人称叙述，作者直接面对读者讲述传名与传主名的由来，在这一过程中，也充分展现了作传人的特点：慨叹《新青年》提倡洋字，致使“国粹沦亡”；嗜好文言古语、调侃、饶舌。可见他是一个个性鲜明的有敌视新化与保古倾向的守旧人物。一看就知道这是真作者虚拟的作者、叙述人。这既为本文用喜剧与反讽的方式叙述阿Q的悲剧故事提供了依据，也使读者自觉地与之拉开距离，怀疑、否定其思想见解的可靠性，从而达到反讽与讽喻目的。

小说第二章起采用第三人称的“有限的全知视角”方式叙述。所谓有限，是指虚拟的作者并未完全退出作品，经常在某种场合以某种方式介入作品，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。分两种情形：

直接的无中介议论。表现为作者直接对作品的人物、事件发表看法。如：

有人说：有些胜利者，愿意敌手如虎，如鹰，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；假使如羊，如小鸡，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。又有些胜利者，当克服一切之后，看见死的死了，降的降了，“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”，他于是没有了敌人，没有了对手，没有了朋友，只有自己在上，一个，孤另另，凄凉，寂寞，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。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，他是永远得意的；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。

说也奇怪，从此之后，果然大家也仿佛格外尊敬他。这在阿Q，或者以为他是赵太爷的父亲，而其实也不然，未庄通例，倘如阿七打阿八，或者李四打张三，向来本不算一件事，必然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，这才戴上他们的口碑。一上口碑，则打的既有名，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。至于错在阿Q，那自然是不必说。所以者何？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。但他既然错，为什么大家又仿佛格外尊敬他呢？这可难解，穿凿起来说，或者因为阿Q说是赵太爷的本家，虽然挨了打，大家也还怕有些真，总不如尊敬一些稳当。否则，也如孔庙里的太牢一般，虽与猪羊一样，同是畜生，但既经圣人下箸，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。

更多的是边叙边议，将作者的议论混合在叙述或描写之中。如：

在阿Q的记忆上，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。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，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，反而觉得轻松些，而且“忘却”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，他慢慢的走，将到酒店门口，早已有些高兴了。

“断子绝孙的阿Q！”

阿Q的耳朵里又听到这句话。他想：不错，应该有一个女人，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，……，应该有一个女人。夫“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”而“若敖之鬼馁而”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，所以他那思想，其实是样合于圣经贤传的，只可惜后来有些“不能收其放心”了。

《阿Q正传》还时常通过书中的人物对作品的事件、人物进行议论，隐含的表达作者的见解。也分两种情况：

一是借小说事件的旁观者“我们”。如：

我们不能知道这晚上阿Q在什么时候才打鼾。但大约他从此总觉得指头有些滑腻，所以他从此总有些飘飘然，“女……”他想。

即此一端，我们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东西。

中国的男人，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，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。商是妲己闹亡的；周是褒姒弄坏的；秦……虽然史无文，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，大约未必十分错；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。

二是借小说事件的参与者——阿Q周围的类群体形象。

《阿Q正传》一再描述阿Q周围的类群体形象对事件人物的议论。如小说结尾写到：

至于舆论，在未庄是无异议，自然都说阿Q坏，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；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？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，他们多半不满足，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；而且那是怎样一个可笑的死囚呵，游了那么久的街，竟没有唱一句戏：他们白跟一趟了。

《阿Q正传》的上述各种方式的议论，不仅会或显或隐地概括、升华作品某一事件、情节的意义，还会借此暗示、启发读者去发现、思考整个作品的深层的意蕴内涵，有力地增强了小说的寓意性与讽喻性。

《阿Q正传》在语言与修辞方面，同样新颖别致。

大量使用某些模糊性词语来表现不确定性。有些词使用频率很高：如：似乎23次；有些19次；仿佛13次；大约8次；几乎6次。另外还有：大抵、大概、大半、茫然、渺茫、有一些、差不多、不甚了然等等。小说还常用假设句、并列选择句、或然句等表示不确定性。这主要是为了增强作品的寓意性与讽喻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小说常常使用模糊性词语来描写阿Q的心态，借此可以反映阿Q的精神世界的麻木，以及他用蒙昧主义的态度来感受、认知世界，这就从更深的层次上暴露出国民的共同精神痼疾。

《阿Q正传》用的是地道的白话，然而却有不少出自中国文化典籍的文言古语。如：立言；名不正则言不顺；著之竹帛；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；若敖之鬼馁而；男女之大妨；而立之年；与其漫也宁敬；不能收其放心；庭训；斯也不足畏也；士别三日刮目相待等。小说还有意使用文言或拟古的句子。如：不朽之笔，须传不朽之人；人以文传，文以人传；大总统上谕宣付国史馆立本传；博雅如此公；夫文章者，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；言出无状；所以者何等。《阿Q正传》还是时常征引古书所载事例，说明书中人物的思想言行无不合乎古训。这都是虚拟的作者、叙述人的人格的自然表露。其目的除了

借此嘲讽当时文坛的保古派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暗示、晓喻国人，书中的人和事，以及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国民性痼疾，无不是古老的中国文化与文明孕育出来的。

无论是描写，还是议论，都常用反语，这是《阿Q正传》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。这不仅仅是一般的修辞方式，而是一个重要的艺术方法。它不仅有力地强化了小说的寓意功能，也大大地提高了小说的讽喻功能。值得提及的是，将《阿Q正传》的每章标题与书中的内容相比照，就会发现其中的诸多反讽寓意。如：“优胜记略”、“续优胜记略”描写的是阿Q靠精神胜利妙法使自己“常优胜”，实际上是反讽他以此掩饰他的“常失败”，结果是导致阿Q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又不思自拔。“恋爱的悲剧”“生计问题”写了阿Q对于“色”与“食”的需求无法满足。食色，性也，这是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。这显然反讽了精神胜利妙法虽然可以满足心灵的需要，却不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。同时还反讽了阿Q的所谓“恋爱”，就是和女人“困觉”。“从中兴到末路”写的是阿Q靠做小偷，暂时解决了“生计问题”。鲁迅曾把人们修史时用的“汉族发达时代”、“汉族中兴时代”，直捷了当地称之为“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”。这不是在反讽阿Q再次“暂时做稳了奴隶”吗？“革命”与“不准革命”写革命在未庄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，不仅从整体上反讽了所谓“革命”，原本是一场滑稽喜剧，而且反讽了包括阿Q“革命”在内所有各阶层人物的所谓“革命”活动，都是在演出这场滑稽喜剧。“大团圆”不是写“奉旨成亲”或“喜结良缘”而是写阿Q被示众枪毙，以及悲剧的男女主角在示众场景里，一个作示众的材料，一个作看客。这显然反讽了“大团圆”的国民性以及反映这种国民性的“大团圆”的中国文学了。小说只写九章，不是凑足十章，这不是有意在与有“十景病”的国人开玩笑吗？

《阿Q正传》采用的独特的话语形式，使它承载了极为丰富多样性的寓意。但小说最基本最主要的寓意有两个，一个是前面论及的对精神胜利的反思与批判，另一个是对阿Q式革命的反思与批判。

阿Q的最卑下的“台”的地位与身份，决定了他只能生活在非理想的生存境遇之中。然而革命给他带来了改变这种境遇的可能。他对革命的期望，概括来说是这样的：

一是报仇泄愤，杀掉未庄“鸟男女”，要一个不留，下跪求饶也不能放过。这不正是鲁迅一再感慨

的张献忠式的屠戮吗？

二是实现理想人生。鲁迅指出：中国的“一切大小丈夫”的“最高理想（！）”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；他们的欲望是：“威福，子女，玉帛”。鲁迅说：“我怕现在的人，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”。^⑪阿Q就是鲁迅心目中的“被这理想支配着”的“现在的人”的象征，也是他之所以成为“国民的魂灵”的重要原因。阿Q借革命来实现的人生目标之一是：“我喜欢谁就是谁”。阿Q要拥有众多的女人，自然会生众多的“子女”了。目标之二是：“我要什么就是什么”。阿Q要把赵、钱二府的财物归为己有，这不是对“玉帛”的欲望满足吗？目标之三是：占有自己的财物，自己是不动手的，要叫小D来搬，而且要搬得快，搬得不快打耳光。这不是对“威福”欲望的满足吗？

由此可见，阿Q式革命，只会是张献忠式的屠戮，对社会只能造成寇盗式的大破坏，其结果无非是易主易姓，改朝换代。然而奴才作了主人，对奴才的凌虐、奴使，会比以往的主人还可怕。有人由于对《阿Q正传》文体类型的误读，批评小说写阿Q那样的人，竟然会做起革命党来，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。对此鲁迅于1926年12月作了这样回答：“据我的意思，中国倘不革命，阿Q便不做，既然革命，就会做的。我的阿Q的运命，也只能如此，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。民国元年已经过去了，无可追踪了，但此后倘再有改革，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。^⑫了解20世纪中国社会史的人，谁能说鲁迅的预见是错了呢？

北大教授高一涵曾在一篇文章中，真实记录了《阿Q正传》刊载过程中在知识界引起的反响：“我记得《阿Q正传》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，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，恐怕以后要骂到他头上。并且有一位朋友，当我面说，昨日《阿Q正传》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。因此，便猜疑《阿Q正传》是某人作的，何以呢？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。…从此疑神疑鬼，凡是《阿Q正传》中所骂的，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”。^⑬这种艺术效果与小说采用别致新颖的讽喻小说话语形式有直接关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鲁迅写《阿Q正传》暴露中国民族的国民性弱点，但不少外国作家、学者认为，本民族也有阿Q相或阿Q主义、阿Q精神。美国著名文学教授莱尔甚至认为：“事实上，阿Q也是全世界的人中的‘每一个（every man）’”。^⑭当人面对非理想的世界、人生、自我，感到无能为力、无可奈何时，阿Q式的精神胜利恐怕是

“鲁迅与‘五四’新文化精神”学术研讨会综述

由广东省文联、广东鲁迅研究学会、茂名市鲁迅研究学会联合主办的“鲁迅与‘五四’新文化精神”学术研讨会，于1999年6月18、19日在广东茂名市召开。

来自全国各地的鲁迅研究专家、学者50余人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从文艺学、社会学、考证学、比较学、历史学等不同的角度剖析了鲁迅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，探究了鲁迅研究的现实意义及其发展趋势，并就如下几个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。

关于鲁迅研究与新儒学及诸子

有学者认为，同龄的“五四”运动与新儒学旗鼓相当、相映成趣，构成了二十世纪一道绚丽的人文景观。下个世纪的鲁迅及鲁迅研究将遭受新儒学更猛烈的冲击。鲁迅研究今后的生命力，一个重要的方面，取决于它对现代新儒学的抗衡能力。然而，鲁迅研究的出路，不是吃掉新儒学，而是找出鲁迅研究与新儒学“沟通”的障碍，使之相互融合、共同发展。只有超越“五四”和新儒学，摒弃“五四”与新儒学的局限，将两者的光点融汇在一起，妥善地吸收两种优秀的文化遗产，才能绽放出中华新文化的奇花异葩。

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，认为鲁迅研究应被儒学所包容。这种包容不是鲁迅所要求的，也不是鲁迅给予我们的准则，而是因为鲁迅从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是辉煌的存在，反认为自己作品的消亡才能证明社会的进步。鲁迅研究与儒学应按其形态各

有发展，同时彼此又能包容对方乃至其他的文化内容。事实上，鲁迅与诸子思想有着深厚的渊源，其作品与诸子学说有着极为广泛的内在联系。

关于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

有专家认为，鲁迅对暴虐和愚昧的专制下积久而成的国民性弱点的批判，是极具历史和人性深度与精神个体性的思想特征的。鲁迅一生坚持这种既积极入世又独立自主的文化品格，他始终是一个对旧道德、旧政治、旧社会、旧文化的深刻而彻底的伟大的批判者。

上述观点的核心在讨论中带有普遍性，但论者阐述的角度则有所不同。另一种说法是，以“立人”为价值指归的文化启蒙是鲁迅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产。鲁迅一生致力于文化思想的批判性重建与启蒙，不仅是鲁迅文化价值观的基本体现，而且有着更为坚实的历史依据，它是鲁迅以自己苦痛的人生体验，反思以往政治革命的结果。鲁迅实在是渴望在人类主义不断进步的宏伟背景下，发挥文化主体的自由创造性，建立一种既不同于文化民族主义又不同西方中心主义，但又极具民族性与现代性色彩的文化类型。

也有学者把鲁迅从青年时代弃医从文提倡“立人”，到后来研究国民性问题，视为是他在从事精神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活动。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并

(下转第38页)

一种最习常的选择。人类的天性是永不满足。因此，人类必然永远面对的是非理想的世界、人生、自我，阿Q式的自欺自慰必然成为人类永恒的心理机制。适度的精神胜利，不仅是人类生存的需要，也是对人类生存有益的。无论中外读者，之所以会从阿Q这一形象身上受到诸多深刻的哲理性启迪，同样与小说的独特的讽刺文体和讽刺写法密不可分。

注释：

《且介亭杂文 答 戏 周刊编者信》。

⑬ 涵庐(高一涵)：《闲话》，1926年8月21日
《现代评论》第4卷第89期。

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。

《俄文译本 阿Q正传 序及著者自叙传略》。

周作人：《关于 阿Q正传》。

《坟·呐喊 自序》。

《坟 娜拉走后怎样》。

⑪ 《热风·五十九 “圣武”》。

⑫ 《华盖集·阿Q正传 的成因》。

⑯ 威廉·A·莱尔：《鲁迅的现实观》。

(杜圣修 黑龙江大学中文系 邮编 150080)